

上下沟通与信息传递

——唐长安城门的政治空间意义

万 晋

摘要：唐都长安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典型都城。尽管中古时期的城市已悄然开始发生某些变化，但六至九世纪的长安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唐长安的城门在作为城市重要建筑的同时，更具有政治空间层面的多重意义。本文即是对城门在有唐一代王朝政治中的功能和意义进行的探讨。

关键词：唐，长安，城门，政治空间

近年来，城市史研究在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领域广泛兴起，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有关唐宋之际都城的研究成果尤其丰富。大陆学者在城市考古、都市制度、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台湾学者严耕望先生着力于城市交通领域，硕果累累；日本学者佐藤武敏、平冈武夫、足立喜六、金子修一、妹尾达彦、中村圭尔、古濑奈津子、穴泽彰子等先生的研究为都城长安研究开辟出独特的视角。但对于唐长安三重城制下的城门，除考证性成果之外，学界就其功能和意义的研究仍留有空白，本文就是基于这一思路的一次尝试。

一 唐长安的三重城制

唐长安的城市基本结构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重城制。宫城位于全城北部正中的位置，太极宫居宫城中央，东西两侧分别为东宫和掖庭宫。南接宫城的是皇城，皇城的高墙之内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中央官僚机构。这也是隋唐两代都城将官衙卫府与百姓居住区完全分离，一改两汉“宫阙之间，并有人家”¹之状况的重要体现。高宗龙朔二年（662年）起重建的大明宫和作为玄宗戏剧性生涯舞台的兴庆宫，分别位于太极宫的东北部和东南部，习惯上被称为“东内”和“南内”。大明宫在安史之乱后作为唐中央政治的核心地，承担了绝大部分原本属于太极宫的机能。唐后期长安城政治中心从太极宫向大明宫的转移，直接带动了城市整体布局和结构的若干变化，使得在特殊时代背景之下城市社会生活的区域性空间特征凸显出来。

将城门作为史学研究对象，在探究城门的功能和意义之前，有必要依据传世文献及城市考古成果理清城门的位置、名称及其沿革：

1、宫城城门

《雍录·唐宫总说》记：“唐都城中有三大内：太极宫者，隋大兴宫也，固为正宫矣。高宗建大明宫于太极宫之东北，正相次比，亦正宫也……太极在西，故名西内。大明在东，故名东内。别有兴庆宫者，亦在都城东南角，人主亦于此出政，故又号南内也。”²三大内作为有唐一代不同时期体现皇权至高无上的地理中心和政治核心地，其城门也具有更加明确的表征意义。

对于太极宫的城门名称及数量，学界颇有争议。寻其史料来源，主要依据宋敏求《长安志》的记载和清人徐松的考证。《长安志》记：“西内正殿南承天门（原注：南面有六门）。门东曰长乐门，次东曰广运门，次东曰重福门（原注：即东宫之正门），次东曰永春门。承天门之西曰永安门……东面一门凤凰门。西面二门南曰通明门，北曰嘉猷门。北面三门，正北曰定武门，次东曰安礼门，

¹ 《类编长安志》卷二，第42页。

² 【宋】程大昌：《雍录》卷三，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3页。

东宫北门曰元德门。”³徐松《唐两京城坊考》载：“宫城，亦曰西内，其正牙曰太极殿。城之南面五门，正南承天门……承天门东长乐门，长乐门内东左藏库。承天门西广运门，广运门内有西左藏库。长乐门东永春门。广运门西永安门。东面一门凤皇门。西面二门，南通明门，北嘉猷门。北面二门，中为定武门，定武门东安礼门。”⁴这两条史料记载的分歧主要在宫城南面的城门。宫城中央为太极宫，太极宫之东为东宫的建制，使得何为太极宫之门、何为东宫之门的问题，在自北宋以降的文献记载中久有异辞。辛德勇在《唐长安宫城南门名称考实》中考证各类史料并综合日本学者的研究，提出太极宫南面自东向西为永安门、承天门、长乐门，东宫之南自东向西为广运门、重明门、永春门⁵，应是颇为精当的，本文即采用这一说法。而宫城东、西、北三面，东为凤凰门，西为通明、嘉猷二门，北为玄武、安礼、玄德三门，当无异议。

太极宫城门名称在隋唐时期的变化⁶：承天门：隋开皇二年（582年）作，初名曰广阳门，仁寿元年（601年）改曰昭阳门，唐武德元年（618年）改曰顺天门，神龙元年（705年）改曰承天门。外有朝堂，东有肺石，西有登闻鼓。⁷凤凰门：隋曰建春门，后改通训门。明皇时，凤凰飞集通训门，诏改曰凤凰门。⁸

龙朔二年（662年）起，高宗重建大明宫并开始于此听政。但直到安史之乱后，大明宫才成为真正意义上唐长安政治的核心地和中央集权政治的主要舞台。妹尾达彦的研究表明，八世纪末到九世纪前半期的大明宫，其建筑构造与当时政治、社会机构有着密切的关联。大明宫的建成，使唐代宫廷仪礼从与天及皇族祖先密切相关，转变为以官人为多数参加的、现世的、世俗的仪礼。⁹大明宫的宫城各城门，《两京新记》载“宫南面五门，正南丹凤门，次东望仙、延政门；次西建福、兴安门。”¹⁰东、西、北三面分别有太和、日营、玄武诸门¹¹。其中丹凤门“至德三载（758年）改明凤门，寻复旧名。”¹²史料记载各门的方位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实测大明宫遗址的成果¹³基本一致。

兴庆宫于开元二年（714年）置，因位于兴庆坊而得名，是唐长安城内重要的宫殿群之一，在玄宗时代一度成为王朝政治的中心舞台。与西内太极宫和东内大明宫有所不同，兴庆宫的修建以西向的兴庆门为宫之正门，兴庆殿为正殿。兴庆门之南曰金明门，南面二门为通阳门和明义门，东城墙外为夹城复道，所谓“六飞南幸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¹⁴。北面有丽苑、跃龙、芳苑三门。宫城西南隅的花萼相辉楼和勤政务本楼临街而立，迫近繁华的东市，演绎出不少关于太上皇玄宗的故事，更成为中央与地方、朝廷与民众相接触的特殊场所，具有与太极宫正南承天门广场相似的意义和作用。这两楼虽不是位于南内宫城中轴线之上，但其横跨兴庆宫西南两面，分别面朝两边的道路，两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建筑构造上的舞台彰显功能，使得牡丹飘香、华丽壮观的兴庆宫更多地展现在长安民众面前。

³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六，第65页。

⁴ 【清】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页。

⁵ 辛德勇：《宫城南门名称考实》，氏著《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93—102页。

⁶ 由于避讳产生的名称变化，如清人刻本改“玄”为“元”等，不在此内。

⁷ 《长安志》卷六，第65页。

⁸ 《长安志》卷六，第66页。

⁹ 妹尾达彦：《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第97—108页。

¹⁰ 【唐】韦述撰、辛德勇辑校：《两京新记》卷一，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6页。

¹¹ 《长安志》卷六，第72页。

¹² 同上。

¹³ 《陕西唐大明宫含耀门遗址发掘记》，《考古》1988年第11期，998—1001页。

¹⁴ 【唐】杜牧：《长安杂题长句六首之五》，《樊川诗集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18页。

2、皇城城门

宋敏求《长安志》载唐长安皇城“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南面三门正南曰朱雀门，东曰安上门，西曰含光门。东面二门南曰景风门，北曰延喜门。西面二门南曰顺义门，北曰安福门。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其间并列台省寺卫。宫城南门外有东西大街，承天门外横街之南有南北大街曰承天门街。”¹⁵其中安上门“至德三载改为光天门，寻复旧。”¹⁶

皇城与宫城之间以一条横街相隔，这座空间里聚集了除在宫城之外的其他绝大多数官僚机构。皇城和宫城共同维护了“三朝”制度¹⁷，各级官署整齐有序地分列其中。皇城作为政治中心宫城与长安居民聚集的外郭城区的沟通和交接地带，其城门常常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3、外郭城城门¹⁸

外郭城城门承担着城市和郊区的联系，在筑起城墙的古代城市，城内城外的联系就只有通过城门来进行。宋敏求《长安志》载唐长安“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南面三门正中曰明德门，东曰启夏门，西曰安化门。东面三门北曰通化门，中曰春明门，南曰延兴门。西面三门北曰开远门，中曰金光门，南曰延平门。北面一门曰光化门。皇城之东五门（原注：并见上大明宫），皇城之西二门，当皇城西第一街曰芳林门，当皇城西第二街曰光化门。”¹⁹又记禁苑“南面三门，中曰景跃门，东曰芳林门，西曰光化门”²⁰。另《唐两京城坊考》载“北面即禁苑之南面也，三门皆当宫城西。中景跃门，东芳林门，西光化门。”²¹宋敏求所记“皇城之东五门”即为大明宫南面的五座城门，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看作是外郭城的城门。而光化、景跃、芳林三门，则是出入禁苑的通道，于外郭城与禁苑相接的北缘自西向东排列。以上三门虽都处于同一街，但其被利用之频繁程度，或说是在史料记载中出现的频繁程度，还是有一定的差别。芳林门为禁苑南门，处于宫城西墙与外郭城相接的特殊位置。对于不适宜穿过宫城北面的城门进入禁苑的人员，芳林门是最便捷的通道，与此有关的一个群体也因此被习惯性地称为“芳林十哲”²²。有关芳林门的记载，另举几例如下：

（徐齐聃）高宗时为潞王府文学、崇文馆学士，侍皇太子讲修书于芳林门。²³

景龙四年（710年）正月八日立春，上命侍臣自芳林门经苑东展仗，入望春宫迎春，内出采花树，人赐一枝。²⁴

中宗令学士自芳林门入，集于梨园，分朋拔河。²⁵

与光化、景跃两座城门相比，芳林门因距离太极宫较近而更多地被作为皇家仪式展开的舞台，

¹⁵ 《长安志》卷七，第77页。

¹⁶ 同上。

¹⁷ 所谓三朝，即外朝、中朝、内朝。《唐六典》卷七“工部”条载：“若元正、冬至大陈设，燕会、赦过宥罪，除旧布新，受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本注：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内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焉。本注：盖古之中朝也。”“又北曰两仪门，其内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焉。本注：盖古之内朝也。”第217页。

¹⁸ 限于本论题的研究重点，对于外郭城的探讨侧重东、西、南三面的城门。对于出入禁苑的光化、景跃、芳林三门，在此略作讨论。

¹⁹ 《长安志》卷七，第83—84页。

²⁰ 《长安志》卷六，第69页。

²¹ 《唐两京城坊考》卷二，第34页。

²² 【五代】王定保撰、姜汉椿校注：《唐摭言校注》卷九，芳林十哲：（懿宗）咸通中白云翔辈凡十人，今所记者有八，皆交通中贵，号芳林十哲。芳林，门名，由此入内故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187—188页。

²³ 【唐】张说：《唐西台舍人赠泗州刺史徐府君碑》，《张燕公集》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3页。

²⁴ 【宋】李昉：《太平御览》卷二〇，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99页上。

²⁵ 【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97页。

甚至在元和十三年（818年），西市百姓还在这里举行过一定规模的集会——“无遮僧斋”²⁶。而在此之前一年，宪宗刚刚修建了自芳林门通至修德坊兴福寺的夹城。²⁷尽管如此，外郭城邻接禁苑的北缘三门，还是因禁苑为皇家园林的特殊性而与东、西、南面的外郭城城门截然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仪式和规范对城门的区域空间选择，体现出社会空间运作过程中诸因素的相互制约与协调。

外郭城城门名称在有唐一代的变化：通化门：至德二载（757年），改为达礼门。《长安志》引《两京道里记》记“通化门改达礼门，识者曰‘三年之丧，天下达礼，非嘉名。’三年而玄、肃晏驾，还复旧名也。”²⁸延兴门：《唐两京城坊考》引《雍录》“长安城东面三门，有安兴。是延兴先为安兴，不知何时改。”²⁹

二、宫城城门构建的政治空间

城门在政治层面作为社会空间的意义，首先是以皇帝亲临或由官方主持的仪式和活动这样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城门作为宫城、皇城、外郭城之间的交界点，借助其高大的门楼以及门前与主干道共同构建的开敞空间，形成具有舞台性质的“场”，很容易得到高度的聚焦和关注。以城门为地点举行的仪式和活动，也因为这样的场景选择而凸显其规模的宏大和地位上的重要性。由于皇城之内官府机构的集中，必然会有很多政令或公告需要对长安民众“广而告之”，上下信息得以最大限度地交换和传达的地点，城门亦是最优的选择。

以城门为地点举行的仪式和活动，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皇帝即位、大赦和赏赐、国家祀典、宣慰和献俘仪式、送行和迎接、节庆娱乐以及有关佛事的活动等。其中前两者多选择宫城城门为仪式举行的场所。

对于宫城而言，作为外朝核心地的承天门是皇帝亲临和朝廷举行各类仪式最为频繁的城门。《唐六典·工部》载“若元正、冬至大陈设，燕会，赦过宥罪，除旧布新，受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³⁰承天门前横街和贯穿南北的中轴线承天门街，最大限度地彰显这一城门在唐帝国政治运行中的突出地位。有唐一代几乎全部的皇帝即位仪式，和大明宫替代太极宫成为唐长安的政治中心之前的重要宣敕、朝贺、大赦和赏赐等，皆在此举行。处于长安城中轴线之上、又作为宫城正门、外朝核心地的承天门，在王朝政治和仪礼体系中具有方位上的权威意义。《大唐开元礼》中有多处是以承天门为界规定的礼制细则：皇帝冬至祀圜丘，銮驾出宫，“驾出承天门，至侍臣上马所，黄门侍郎奏称请銮驾权停，敕侍臣上马”³¹；銮驾还宫，“驾至承天门外，侍臣下马所，銮驾权停，文武侍臣皆下马”³²；皇帝宴蕃国使，“所司迎引使者至承天门外，通事舍人引就次”³³；皇帝讲武毕，“文武群官至承天门外，舍人承制，敕群官还”³⁴，等等。可见，承天门作为自皇城进入宫城的正门，在唐国家礼仪的建构体系中，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地点分界：对于百官来说，门外是日常熟悉的办公地带，门内则是皇权威严的象征。在这里举行的赏赐和宴会，规模和级别都较

²⁶ 《册府元龟》卷五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579页下。

²⁷ 【宋】王溥：《唐会要》，卷三〇，《杂记》，第655页。（元和）十二年四月，诏左右神策军以众二千筑夹城，自云韶门过芳林门，西至修德里，以通于兴福佛寺。

²⁸ 《长安志》卷七，第83页。

²⁹ 《唐两京城坊考》卷二，第33页。

³⁰ 《唐六典》卷七，工部，第217页。

³¹ 《大唐开元礼》卷四，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9页上。

³² 《大唐开元礼》卷四，第44页上。

³³ 《大唐开元礼》卷八〇，第391页上。

³⁴ 《大唐开元礼》卷八五，第410页下。

高，参加者以皇亲国戚和中高层官员为主，所谓“长说承天门下宴，百官楼下拾金钱”³⁵，实只限于中书门下五品及诸司三品以上的官员。³⁶值得注意的是玄宗开元六年（718年）在承天门的一次授官和赏赐：“十一月辛卯，至自东都。丙申，亲谒太庙，回御承天门，诏：‘七庙元皇帝已上三祖枝孙有失官序者，各与一人五品京官。内外官三品已上有庙者，各赐物三十匹，以备修祭服及俎豆。’赐文武官有差。”³⁷玄宗从东都洛阳返回长安，在太庙的礼祀仪式结束之后，返回到承天门宣布这次赏赐。开元六年（718年）前后，玄宗是在大明宫听政的，而承天门在玄宗时代，仍然被选择作为颁布赏赐之诏令的地点，这至少说明，其作为西内太极宫的标志性地点的意义，并没有动摇。正如妹尾达彦在其研究中提到的，并不是所有的宫廷仪礼都伴随政治中心的变动而转移到了大明宫，其中大丧、即位仪式、太庙、太社及郊祀等与隋唐初长安城的都市计划密不可分的宫廷仪礼，就没有移迁。³⁸因为是“亲谒太庙”之后的颁诏，玄宗还未返回到座落于长安城东北的大明宫，所以承天门就成为记录这次赏赐的舞台。同样是在玄宗时代的开元二年（714年）五月，吐蕃宰相盆达延陀献书，曰“两国地界，事资早定，界定之后，然后立盟”，当月，“吐蕃使其宰相尚钦藏及御史名悉猎来献盟书。”玄宗即“御承天门楼，命有司引见，置酒于内殿，宴遣之。”³⁹唐朝皇帝亲自登上承天门楼接见少数民族首领，且“置酒于内殿”，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由此透视出的是唐中央与吐蕃之间的微妙关系：开元年间，势力不断扩张的吐蕃已在陇右和西域地区构成对中央朝廷的威胁，唐廷对通过盟书维持边境的相对稳定，缓和同强盛的吐蕃之关系的认可，借用在承天门举行仪式的隆重性表现出来。承天门本身，以及在承天门举行的仪式，明确了内外之限、上下之别——皇权威严在这里得到最充分而直观地展现和不遗余力地强调。

构成仪式现场的要素，通常包括表演者、观者和记录者三个方面。在承天门举行的皇家仪礼中，皇帝和王公百官即是整个事件的表演者和直接参与者。由于皇家活动的某些私密性需要和宫廷仪礼的神圣性，除记录者即史官之外，仪式的直接参与者和观者发生了身份上的重叠。见证这些仪式的群体范围十分有限，并且具有身份和等级上的严格限制。然而，无论是新皇帝的即位还是赏赐，抑或与少数民族首领缔结的盟约，这样于国于民的重大事件，最终会通过一定的传播方式和渠道使民众周知。除诏令自上而下的运行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官员以普通民众身份进行的接受和再传播。而皇帝的恩赦仪式，参与的群体范围就大了许多，旁观者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将这一与其他仪礼有所不同的仪式单独做一分析。⁴⁰

定期和非常时的赦免是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特征之一，是皇帝统治广土众民、贯彻皇权的必要手段。大赦的仪式通常是展现在公众面前的，包含免罪和恩赏的“浩荡皇恩”，得以一层层下达到百姓中间。无论其最终执行的力度如何，毕竟是将皇帝的恩泽广被四方、下达万民的重要方式。有唐一代在承天门宣布的大赦，通常伴随新一任皇帝的即位或改元进行，恩赦的范围一般较大，“常赦所不免并原之”⁴¹。或皇帝在郊庙、圜丘祭礼结束后，御宫城城门大赦天下。另外在承天门也有

³⁵ 【唐】张祜：《退宫人》，《张祜诗集》卷四，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9页。

³⁶ 《旧唐书》卷八，开元元年（713年）九月乙卯，宴王公百僚于承天门，令左右于楼下撒金钱，许中书门下五品已上官及诸司三品已上官皆拾之，仍赐物有差。第171页。

³⁷ 《旧唐书》卷八，开元六年（718年）十一月辛卯，第179页。

³⁸ 妹尾达彦：《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第97页——108页。

³⁹ 《唐会要》卷九七，“吐蕃”，第2053页。

⁴⁰ 陈俊强著《皇权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系统梳理了北朝至隋唐恩赦制度的流变，对恩赦的频率、恩赦与礼制、恩赦的内容和效力以及与恩赦有关的曲赦、降罪、录囚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所涉及的恩赦，论述的着力点主要在仪式的地点及其参与者之层面，探讨的范围仅限于在城门举行的恩赦仪式。

⁴¹ 《旧唐书》卷七，（睿宗）即皇帝位，御承天门楼，常赦所不免并原之。第154页。

过多次临时性的恩赦。（表二）

表二

时间	事件	地点	史料出处
太宗贞观七年 (643年)	四月丙戌，立晋王为皇太子。是日，帝御承天门楼，大陈仗卫。文武百辟列于外，京邑士女重叠而观者，皇城街悉满。当道中树金鸡，大赦天下。	承天门楼	《册府元龟》卷八十四
中宗景龙二年 (708年)	崇训死，主素与武延秀乱，即嫁之。是日，假后车辂，自宫送至第，帝与后为御安福门临观……翌日，武攸暨与太平公主偶舞为帝寿。赐群臣帛数十万。帝御承天门，大赦，因赐民酺三日，内外官赐勋，缘礼官属兼阶、爵。	承天门	《旧唐书》卷七
中宗景龙四年 (710年)	(睿宗)即皇帝位，御承天门楼，常赦所不免并原之。内外官四品以上加一阶，相王府官吏加两阶。流人长流、长任未还者并放还。	承天门楼	《旧唐书》卷七
中宗景龙四年 (710年)	七月己巳，睿宗御承天门，皇太子诣朝堂受册，是日有景云之瑞，改元为景云，大赦天下。	承天门	《旧唐书》卷八
玄宗先天二年 (713年)	兵部尚书郭元振从上御承天门楼，大赦天下，自大辟罪以下，无轻重咸赦除之。	承天门楼	《旧唐书》卷七
穆宗长庆元年 (821年)	乃月正日，陛下有事于南郊回，御丹凤楼赦天下。	丹凤楼	《文苑英华》卷四百九十
武宗会昌五年 (844年)	(正月)辛亥，有事于郊庙，礼毕御承天门，大赦天下。	承天门	《旧唐书》卷十八上
僖宗文德元年 (888年)	(二月戊子)上御承天门，大赦，改元文德。	承天门	《旧唐书》卷十九下
昭宗龙纪元年 (889年)	(十一月)甲寅，圜丘礼毕，御承天门，大赦。	承天门	《旧唐书》卷二十上

梳理有关史料之后，我们发现，除在宫城正门（包括太极宫承天门、大明宫丹凤门）举行的大赦之外，于其他城门举行的赦免，次数十分有限（表三）。

表三

时间	事件	地点	史料出处
中宗景龙四年 (710年)	六月辛丑，帝（睿宗）挟少帝御安福门楼慰谕百姓，大赦天下，见系囚徒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	安福门楼	《旧唐书》卷七
玄宗先天元年 (712年)	冬十月庚子，皇帝亲谒太庙，礼毕，御延喜门，大赦天下。	延喜门	《旧唐书》卷七

陈俊强在其研究中指出，唐代的赦免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国家祭典，一是皇室喜庆。另外，诸如武后行新政、中宗复新政、德宗行两税法、武宗整顿佛教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都是借助恩赦下达的。由以上两表，对于唐代皇帝在城门举行的恩赦，大致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其一，恩赦仪式的地点选择，以宫城正门（承天门或大明宫丹凤门）为主，偶有在安福门和延喜门举行的恩赦，但为数不多。作为皇权象征的恩赦仪式，永远都是在皇城之内进行的。其二，所有的恩赦仪式中，皇帝皆亲御城门楼之上，亲临现场，亲自将恩德遍布到王朝子民中间。

唐代的恩赦，无论是在承天门、丹凤门还是在安福、延喜门，这样象征“皇恩浩荡”的仪式都拥有众多的参与者：不仅仅是皇亲国戚、王公百官，还有相当数量的父老、囚徒，这些人作为恩泽的接受者出现在仪式的现场——百官享受赏赐，囚徒得以免刑，父老也许会得到逋欠租税的一笔勾销。而这样的仪式，必然是无比隆重的。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庞严的对策言：“乃月正日，陛下有事于南郊回，御丹凤楼赦天下。臣与百姓咸观，列在大陆之南。祥风北来，时聆德音，乃闻有直言极谏之召，私自快喜，得进所志于今日也。”⁴²帝王的德泽随着赦书的颁行而惠及众民，宏大的宣行场面无疑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新唐书·百官志》“中尚署”条载：“赦日，树金鸡于仗南，竿长七丈，有鸡高四尺，黄金饰首，衔绛幡长七尺，承以彩盘，维以绛绳，将作监供焉。击柝鼓三声，集百官、父老、囚徒。坊小儿得鸡首者官以钱购，或取绛幡而已。”⁴³恩赦仪式开始之前，“先建金鸡，兼置鼓于宫城门之右”，而后“视大理及府、县囚徒至，则挝其鼓”⁴⁴。唐太宗贞观七年（643年）立晋王为皇太子后的一次大赦，《册府元龟》记载当时承天门外的场景：“是日，帝御承天门楼，大陈仗卫。文武百辟列于外，京邑士女重叠而观者，皇城街悉满。当道中树金鸡，大赦天下。”⁴⁵承天门楼之上，是太宗仪临天下的国君风范；承天门外，文武百官按序站班；承天门街之上，则聚集了为数众多的京城士女。承天门与其前的横街，以及皇城中央的承天门街，共同构成一个“T”形空间，作为惠及万民的恩赦仪式之舞台。借助这一仪式，京城百姓得以进入到平日被严格戍卫的皇城之内，成为典礼的直接见证者。皇帝宣赦释囚之后，长安小儿争先沿绛绳而上，抢夺鸡首及绛幡，所谓“日照彩盘高百尺，飞仙争上取金鸡”⁴⁶。这样一个简洁而郑重的仪式，其象征意义也许远远超过史料中平铺直叙的书写。在皇权恩赦之日的清晨，皇城城门对百姓暂时的开放，人们以市民个体的身份涌入城墙之内的宫廷要地，参与这场仪式。尽管仪礼过程中的限制必然繁杂苛刻，但对于聆听赦书宣读的百姓，这扇城门的打开成为对其作为大唐子民的正式身份的象征，无疑具有非常的意义。

龙朔二载（662年）高宗重建大明宫并开始在这座位于长安城东北的宫城听政。但直到安史之乱后，大明宫才正式替代了太极宫的大部分职能，成为唐代政治的核心地。玄宗在开元二年（714年）从太极宫迁往大明宫，但在开元十六年（728年）以后的时日，都是常居在春明门内的兴庆宫里。肃宗收复长安以后即位的皇帝，都以大明宫为长期的居住、听政场所。丹凤门进而作为皇帝改元、大赦、宴见使节等外朝大典的舞台而发挥作用，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云“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⁴⁷，张祜《元日仗》诗云“文武千官岁仗兵，万方同轨奏升平。上

⁴² 庞严：《对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策》，《文苑英华》卷四九〇，第2509页上。

⁴³ 《新唐书》卷四八，第1269页。

⁴⁴ 《唐六典》卷一六，第464页。

⁴⁵ 《册府元龟》卷八四，第989页上。

⁴⁶ 【唐】王建：《宫词一百首之十一》，《王建诗集》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8页。

⁴⁷ 【唐】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88页。

皇一御含元殿，丹凤门开白日明。”⁴⁸两《唐书》中亦多处可见皇帝亲临丹凤楼之仪式的记载。相对西内太极宫而言，大明宫一个重要的改变就是宫城之内官署和宫殿的集中。太极宫内外朝的核心地承天门前广场面对的是官署的集中地皇城，而与大明宫丹凤门直接相向的是光宅、翊善二坊。宫城正门与长安居民所居住的坊之间，相隔的距离大大缩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强化了其作为和民众接触的場所而发挥的作用。大明宫以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为中轴线，借助地势构造出的高度差，给在这里举行的仪式带来了戏剧性的效果。⁴⁹宪宗元和二年（807年），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门外⁵⁰，参朝的文武百官于待漏院等候自丹凤门上朝，张籍《赠姚合》诗曰“丹凤城门向晓开，千官相次入朝来”⁵¹。

政治中心由太极宫向大明宫的东移，带来的是官方仪式的地点和场所以及皇帝出行的方式和路径等方方面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同时使得居住在长安城的官员和百姓往城东的活动频率大幅增加，唐都长安的政治运作空间发生了明显的变动，进而带动了整个都城社会空间的某些改变——外郭城东面的通化门和春明门承载的功能较唐前期更加丰富；城东逐渐聚集为数更多的官员；唐后期藩镇于长安所设的进奏院全部在城东，以崇仁坊和平康坊最为集中；朱雀街西的城市社会表现出更多的平民化特征。

三、皇城和外郭城城门构建的政治空间

唐承隋制，“于国城西北十里亥地，为司终、司命、司禄三坛，同壝。祀以立冬后亥。国城东北七里通化门外为风师坛，祀以立春后丑。国城西南八里金光门外为雨师坛，祀以立夏后申。坛皆三尺，牲以一少牢。”⁵²“隋五时迎气。青郊为坛，国东春明门外道北去宫八里，高八尺。赤郊为坛，国南明德门外道西，去宫十三里，高七尺。黄郊为坛，国南安化门外道西，去宫十二里，高七尺。白郊为坛，国西开远门外道南，去宫八里，高九尺。黑郊为坛，宫北十一里丑地，高六尺。并广四丈。各以四方立日，黄郊以季夏土王日。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以太祖武元帝配。五官及星三辰七宿，亦各依其方从祀。其牲依方色，各用犊二，星辰加羊豕各一。其仪同南郊。其岳渎镇海，各依五时迎气日，遣使就其所，祭之以太牢。”⁵³另“启夏门外西南二里有圜丘及先农、藉田二坛。”⁵⁴僧圆仁来到长安，记“（皇帝）早朝出城，幸南郊坛。坛在明德门前。诸卫及左右军廿万众相随，诸奇异事不可胜计。”⁵⁵由此可见，唐长安的外郭城城门，在国家仪礼体系中承担了重要的一个部分——在距离城门不远之处举行的国家祭祀典礼，被严格纳入国家仪礼体系，或视作祈求“国门之神”以保国安民之举。“唐之郊庙，皆在都城之南。人主有事郊庙，若非自丹凤门出，必由承天门出”⁵⁶，有关国家祭典的实施规定也是非常严格的。《周礼·春官·鬯人》载“凡祭祀，社壝用大壝，祭门用瓢鬯”⁵⁷，《大唐开元礼》记“霖雨不已，祭京城诸门，门别三日，每日一祭。不止，乃祈山川岳渎镇海渎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庙，若州县，祭城门。不止，祈界内山川及社稷，三祭一祈，皆准

⁴⁸ 【唐】张祜：《元日仗》，《张祜诗集》卷三，第65页。

⁴⁹ 参见妹尾达彦：《大明宫的建筑形式与唐后期的长安》。

⁵⁰ 顾炎武：《历代宅京记》，第103页。

⁵¹ 【唐】张籍：《赠姚合》，《张司业诗集》卷六，第56页。

⁵² 《隋书》卷七，礼仪二，第147页。

⁵³ 《隋书》卷七，礼仪二，第130页。

⁵⁴ 《唐两京城坊考》卷二，第33页。

⁵⁵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纪》，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64页。

⁵⁶ 《雍录》卷四，“浴堂殿”，中华书局，2002年，第77页。

⁵⁷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99页下。

京都制，并用酒脯醢。国城门，报用少牢，州县城门用牺牲也。”⁵⁸《旧唐书·五行志》载“(天宝)十三载秋，京城连月澍雨，损秋稼。九月。遣闭坊市北门，盖井，禁妇人入街市，祭玄冥大社，祭门。”⁵⁹除日常的国家祭祀之外，遇有灾荒，都城和地方州县，都要采取“祭城门”之礼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之前，唐宫廷仪礼的另一组成部分“大射”，也常选择城门举行，并且召集百官参加，这说明举行大射之礼的城门前，必然有视野开阔、足够施展的空间存在。《通典》言唐制“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赐百僚射”⁶⁰，先天元年(712年)九月九日，玄宗即位伊始，“御安福门，观百僚射，至八日乃止”⁶¹；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敕“其三九射礼，即宜依旧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赐射于安福楼下”⁶²，这是有唐一代举行的最后一次大射之礼。

此外，唐长安城门又常被当作展现献俘、处决仪式于公众面前的舞台。除太极宫之承天门、大明宫之兴安门、兴庆宫之勤政楼外⁶³，献俘和处决仪式的地点，以皇城东北和西北的延喜门、安福门和外郭城之开远门为集中。详见表四：

表四

时间	事件	地点	史料出处
玄宗天宝九载 (750年)	唐安西四镇节度使执突骑施石国王开远门献俘。	开远门	《玉海》卷一百九十一
德宗贞元七年 (791年)	(十二月)回纥遣杀支将军献吐蕃俘大首领结心，德宗御延喜门观之。	延喜门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
德宗贞元十八年 (803年)	《唐剑南西川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破吐蕃露布》：开远门揭候，坐收西极之旧封。	开远门	《玉海》卷二百零四
宪宗元和十一年 (816年)	同有王承宗部下将兵三百首，梟通化门外	通化门	《册府元龟》卷四三四
武宗会昌四年 (844年)	(八月戊戌)王宰传(刘)稹首与大将郭谊等一百五十人，露布献于京。上御安福门受俘，百僚楼前称贺。	安福门	《旧唐书》卷十八
昭宗龙纪元年 (889年)	(二月)昭宗御延喜楼受俘(秦宗权)。	延喜门	《旧唐书》卷二十上
昭宗乾宁二年 (895年)	(十二月甲申)昭宗御延喜门受俘馘(王行瑜)。	延喜门	《旧唐书》卷二十上

⁵⁸ 《大唐开元礼》卷三，第32页下。《唐六典》也有类似记载，第124页。

⁵⁹ 《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第1358页。

⁶⁰ 《通典》卷七七，第2107页。

⁶¹ 《唐会要》卷二六，大射，第583页。

⁶² 玄宗：《赐百官九日射敕》，《全唐文》卷三五，第386页。

⁶³ 承天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五月，承天门献俘。《旧唐书》卷八，玄宗上，第198页。勤政楼：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三月，壬戌，御勤政楼，大酺。北庭都护程千里，生擒阿布思，献于楼下，斩之于朱雀街。《旧唐书》卷九，玄宗下，第228页。兴安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俘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刘辟子刘超郎等九人，御兴安楼受俘。元和二年(807年)俘浙西节度使李錡、李錡子李师回，御兴安门受俘。元和十二年(817年)十一月丙戌朔，御兴安门受淮西之俘。以吴元济徇两市，斩于独柳树。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己巳，上御兴安门受田弘正所献贼俘，群臣贺于楼下。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俘兑海等州节度使李同捷母、妻、男元达等，御兴安楼下受俘。《唐会要》卷一四，献俘，第323页。武宗会昌四年(844年)，俘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之侄刘稹，梟首两市，武宗于兴安门受首，百僚楼前称贺。《新唐书》卷二一四，刘稹，第6017页。

妹尾达彦将献俘仪式置于皇帝仪礼和长安城的仪礼空间中考察，以太庙为中心探讨献首级、俘虜和战利品的仪式，指出从告捷、献俘仪式和弃市之间，形成民众、军人和皇帝一体互动的空间。⁶⁴《旧唐书·音乐志》记载了包括奏乐、仪仗在内的献俘仪式场景：“候行至太社及太庙门，工人下马，陈列于门外。候告献礼毕，复导引奏曲如仪。至皇帝所御楼前兵仗旌门外二十步，乐工皆下马徐行前进。兵部尚书介冑执钺，于旌门内中路前导。”⁶⁵事实上，唐代长安的献俘仪式，除在太庙，也多在城门举行。皇帝御临城门楼之上，俯观城门楼下的献俘仪式，城门楼上楼下形成的高度差被用以彰显献俘仪式所要表征的中心——大唐皇权的无限威严。

前揭玄宗在承天门楼接受吐蕃宰相献盟书的事例之外，城门在处理与周边少数民族相关的问题中所起的作用和象征意义，在皇城和外郭城的其他城门也有明确的例证。而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永徽元年（650年）五月宝王吐蕃赞府薨，“帝举哀于光化门，遣右武侯将军鲜于济赉玺书往吊祭之。”⁶⁶大中三年（849年），吐蕃宰相杀东道节度使，愿以秦、原、安乐三州和石门、木碛等七关款塞，宣宗命太仆卿陆耽前往慰劳。“七月，河、陇耆老率长幼千余人赴阙，上御延喜楼观之，莫不欢呼忭舞，更相解辫，争冠带于康衢，然后命善地以处之，观者咸称万岁。”⁶⁷薛逢《八月初一驾幸延喜楼看冠带降戎》诗记录下此情此景：“城头旭日照阑干，城下降戎彩仗攒。九陌尘埃千骑合，万方臣妾一声欢。楼台乍仰中天易，衣服初回左衽难。清水莫教波浪浊，从今赤岭属长安。”⁶⁸德宗建中末曾在外郭城西南的延平门与吐蕃会盟，“欲重其诚信，特令告庙”⁶⁹。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纪》载“会昌三年（843年）二月廿五日，和蕃公主入城，百司及三千兵马出城外接。入通化门，入内得对……随公主来回鹞人并不得入城。”⁷⁰皇帝是否亲临城门，迎接仪式的级别差异反映出统治者对待该事件的不同态度。而对于从远方前来的人们来说，城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是进入唐都长安城本身的标志，更重要的则是跨过这座城门，就意味着以不同的身份、各种各样的形式，感受或参与到大唐帝国的政治运作、经济运行和社会变动之中。

由关东入关中的官员、军人、商旅以及东来的遣唐使，很多是由春明门进入这座都城的。圆仁进入长安之前，即宿于春明门外的镇国寺西禅院。⁷¹僖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自灞上率军“入自春明门，升太极殿。”⁷²由长安前往洛阳，也常取道春明门，所谓“莫道两京非远别，春明门外即天涯”⁷³。春明门在文人墨客的笔下，阐发出更多的离愁别绪：“今日春明门外别，更无因得到街西”⁷⁴、“春明门门前，便是嵩山路”。⁷⁵外郭城西面的开远门，则更多地具有由长安城通往西域丝路之起点的表征意义，当时凡言长安去西域的里程，大致都是从开远门算起。这里通常也是西来的商人和使者进入长安的所经之处。东之春明，西之开远，也因此成为时人到达或离开长安城的标志性地点。

城门出入通道之原始功能，使其作为送行、迎接的场所而存在。（见表五）但这些仪式并不仅仅把城门当作出入的通道，亦将其视为城市社会空间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在丧礼中，皇

⁶⁴ 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以皇帝礼仪的舞台为中心》，《中国的思维世界》，第466—498页。

⁶⁵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一，第1054页。

⁶⁶ 《册府元龟》卷九七四，第11443页上。

⁶⁷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下，第5266页。

⁶⁸ 薛逢：《八月初一驾幸延喜楼看冠带降戎》，《全唐诗》卷五四八，第6328页。

⁶⁹ 《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下，第5263页。

⁷⁰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纪》，第410页。

⁷¹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纪》，第335页。

⁷² 《新唐书》卷二二五下，逆臣下，第6458页。

⁷³ 【唐】刘禹锡：《和令狐相公别牡丹》，《刘禹锡集》卷三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17页。

⁷⁴ 【唐】张籍：《赠别王侍御赴任陕州司马》，《张司业诗集》卷四，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41页。

⁷⁵ 【唐】白居易《送张山人归嵩阳》，《白氏长庆集》卷一二，第47页。

帝亲临城门也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见表六)

表五

时间	事件	地点	史料出处
高宗弘道元年 (683年)	(李义琰)乃将归东都田里,公卿以下祖饯于通化门外,时人以比汉之二疏。	通化门	《旧唐书》卷八十一
中宗神龙三年 (707年)	六月乙未,(中宗)亲送朔方军总管韩国公张仁愿于通化门外,上制序赋诗。	通化门	《旧唐书》卷七
德宗建中四年 (783年)	及(哥舒曜)行,帝(德宗)祖通化门。	通化门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五
宪宗元和三年 (808年)	其年九月,(李吉甫)拜检校兵部尚书兼中书侍郎平章事充淮南节度使,上御通化门楼饯之。	通化门	《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
宪宗元和五年 (810年)	乙亥,吐突承璀军发京师,上御通化门,劳遣之。	通化门	《旧唐书》卷十四
宪宗元和十二年 (817年)	八月戊午朔,庚申,裴度发赴行营,敕神策军三百人卫从,上御通化门劳遣之。	通化门	《旧唐书》卷十五
穆宗长庆元年 (821年)	七月辛酉,太和公主发赴回纥,上以半仗御通化门临送,群臣班于章敬寺前。	通化门	《旧唐书》卷十六
穆宗长庆元年 (821年)	十一月辛巳,李光颜赴镇,百僚饯于章敬寺,上御通化门临送,赐玉带名马。	通化门	《旧唐书》卷十六/卷一百六十一
代宗广德二年 (764年)	十一月丁未,子仪自泾阳入觐,诏宰臣百僚迎之于开远门上,御安福寺待之。	开远门	《旧唐书》卷十一
宪宗元和二年 (807年)	十月丁卯,以门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检校吏部尚书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仍封临淮郡公。将行,上御安福门慰劳之。	安福门	《旧唐书》卷十四
穆宗长庆三年 (823年)	杜元颖赴镇蜀,上御安福门饯,因赐皇城留守及金吾卫率等帛有差。	安福门	《旧唐书》卷十六
宣宗大中五年 (851年)	(白)敏中以司空、平章事兼邠宁节度、招抚、制置使。及行,帝御安福楼以饯。	安福门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九
顺宗贞元四年 (788年)	十月,回纥公主及使至自蕃,上御延喜门,禁妇人及车舆观者。	延喜门	《唐会要》卷六

表六

时间	事件	地点	史料出处
宪宗元和十五年 (819年)	(李譔)葬于昭应,有陵无号。发引之日,百官送于通化门外,列位哭送。	通化门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

顺宗贞元十一年（795年）	（马燧）及葬，又废朝，遣百僚于延兴门临送。	延兴门	《册府元龟》卷三百一十九
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年）	（葬卫国公主）上与郭淑妃御延兴门哭送。	延兴门	《旧唐书》卷十九上
代宗广德二年（764年）	（李光弼薨）葬于三原，诏宰臣百官祖送于延平门外。	延平门	《旧唐书》卷一百一十
太宗贞观十九年（643年）	（魏征）公葬日，敕京官文武九品以上及计吏并送至开远门外，太宗幸苑日楼望哭尽哀，令晋王宣敕祭之。	开远门	《魏郑公谏续录》卷下
高宗永徽元年（650年）	永徽元年五月宝王吐蕃赞府薨，帝举哀于光化门，遣右武候将军鲜于济赍玺书往吊祭之。	光化门	《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四
德宗建中二年（781年）	（郭子仪）及葬，帝御安福门，哭过其丧，百官陪位流涕。	安福门	《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七

不同城门所呈现出的功能和意义，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唐长安外郭城东南的延兴门外多为墓葬之地，因此丧礼的送行地点常在此门。清明时节缅怀故人的活动，也曾集中在这里进行。“都人并在延兴门看内人出城洒扫，车马喧闹。”⁷⁶长安城东北郊外则为帝陵集中的区域，唐宪宗葬礼时，“都城人士毕至。前集州司马裴通远家在崇贤里，妻女辈亦以车舆纵观于通化门。及归日晚，驰马骤至平康北街。”⁷⁷在外郭城诸城门中，皇帝亲临次数最多的应为通化门，这与通化门本身所处的位置临近太极宫和大明宫有直接的关系。这里亦是皇帝亲自参加送行和迎接仪式所到达的最远处。皇帝御此亲送即将离都的大臣，多为出征战事，隆重的仪式使官员感受到来自当朝天子的信任和嘱托。也正因通化门临近东内大明宫，这里又常常作为政治事件的发生地。晚唐的泾原兵变中，德宗派出赐帛宣慰的中使于此被杀，参加兵变的军士由通化门入城，进而陈兵于丹凤门外，“小民聚观者以万计。”⁷⁸

在唐代的上元节日里，安福门常常是皇帝观灯的场所。按照唐代的规定，上元节日的三天是没有夜禁的，“月色灯光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⁷⁹。皇帝登上皇城西北的安福门楼，皇城西三条街道和数坊之喧闹景象尽收眼底，“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在这样与民同乐的节日里，皇亲国戚赏灯游乐的规模日益扩大，中宗与韦后御安福门观灯，“灯烛供拟，彻明如昼”⁸⁰；时间大大延长，先天二年（713年）正月上元日夜，“于京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余丈”⁸¹，“胡人婆随请然百千灯，因弛门禁，又追赐元年酺，帝（玄宗）御延喜安福门纵观，昼夜不息，阅月乃止”⁸²，时为太上皇的睿宗也“御安福门观灯，出内人联袂踏歌，纵百僚观之，一夜方罢”⁸³。由此可见，安福门外应有一定的空间，且登楼而望视野较为开阔。正因如此，在安福门还举行过多次的大酺、设乐和百戏：

⁷⁶ 《辇下岁时记》，说郭本，【明】陶宗仪等编《说郭三种》，第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218页下。

⁷⁷ 《太平广记》卷三四五，《裴通远》，第2734页。

⁷⁸ 《资治通鉴》卷二二八，第7352—7353页。

⁷⁹ 【唐】李商隐：《正月十五闻京有灯恨不得观》，《李商隐诗集疏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497页。

⁸⁰ 《旧唐书》卷一八三，外戚，第4734页。

⁸¹ 【唐】张鷟撰，赵守俨点校：《朝野僉载》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9页。

⁸² 《新唐书》卷一二九，严挺之传，第4482页。

⁸³ 《旧唐书》卷七，第161页。

高宗永徽三年（652年），以岁旱，帝避正寝，撤膳，遂降甘雨，相率宴乐，兼奏倡优百戏，帝御安福门楼以观之。⁸⁴

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正月，御安福门，观大酺，有伎人欲持刀自刺，以为幻戏，诏禁之。⁸⁵

景云三年（712年）六月乙卯，上（睿宗）观乐于安福门，以烛继昼，经日乃止。⁸⁶

睿宗延和元年（712年）七月庚申，御安福门宴群公卿士，设太常九部乐，帝夜观乐之。

87

除安福门之外，芳林门也有设乐的记载，如“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四月甲寅，御芳林门张乐设百戏。”⁸⁸文宗则在开成四年（839年）的寒食节走出皇城，“御通化门以观游人”⁸⁹。由于统治者推崇和皇室支持，城门也常作为规模宏大的宗教仪式的舞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十二月，三藏自西域回，太宗“诏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设九部乐，迎经像入寺，彩车凡千余辆，上御安福门观之。”⁹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更为详尽地记载了这场规模盛大的迎送仪式：

十二月戊辰，又敕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将九部乐，万年令宋行质、长安令裴方彦各率县内音声及诸寺幢帐，并使务极庄严。己巳旦，集安福门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陈列于衢衢，其锦彩轩槛，鱼龙幢戏，凡一千五百余乘，帐盖三百余事。先是内出绣画等像二百余躯，金银像两躯，金缕罗幡五百口，宿于弘福寺，并法师西国所将经、像、舍利等，爰自弘福引出，安置于帐座及诸车上，处中而进。又于像前两边各丽大车，车上竖长竿悬幡、幡后布师子神王等为前引仪。又庄宝车五十乘坐诸大德，次京城僧众执持香花，呗赞随后，次文武百官各将侍卫部列陪从，太常九部乐挟两边，二县音声继其后，而幢幡钟鼓匍匐缤纷，眩日浮空，震曜都邑，望之极目不知其前后。皇太子遣率尉迟绍宗、副率王文训领东宫兵千余人充手力，遣御史大夫李干佑为大使，与武侯相知捡校。帝将皇太子、后宫等于安福门楼手执香炉目而送之，甚悦。衢路观者数亿万人，经像至寺门，敕赵公、英公、中书褚令执香炉引入，安置殿内，奏九部乐、破阵舞及诸戏于庭，讫而还。⁹¹

这则史料中提到的安福门街，是整场仪式举行的主要舞台。安福门街即是指从开远门到安福门之间东西向的大道。据足立喜六的实测和文献对比研究，宫城西侧辅兴坊和颁政坊之间的这条道路宽广百步，折合为151.5公尺，超出了宫城与皇城两侧另外两条东西向街道的宽度，而与承天门街和朱雀门街的宽度相同。⁹²连通开远门和安福门的这条街道，不仅仅是外郭城西北门直达皇城城门的交通要道，且兼有宫城和皇城西面广场的功能。

晚唐佛教地位又一次被提高的表现，最典型的莫过于懿宗皇帝在咸通十四年（873年）四月八日的迎佛骨仪式。这场仪式选择了与上述事件完全相同的路线和舞台：

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至安福楼，夹道佛声震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门，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幡花幢盖之属，罗列二十余里。间之歌舞管弦，杂以禁兵兵仗。缙徒梵诵

⁸⁴ 《册府元龟》卷一一〇，第1306页上。

⁸⁵ 《唐会要》卷三四，杂录，第733页。

⁸⁶ 《旧唐书》卷七，第160页。

⁸⁷ 《册府元龟》卷一一〇，第1308页上。

⁸⁸ 《旧唐书》卷一七下，第577页。

⁸⁹ 《旧唐书》卷一七下，第577页。

⁹⁰ 【唐】段成式著，杜聪校点：《酉阳杂俎》续集卷六，《寺塔记下》，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193页。

⁹¹ 【唐】慧立、彦惊著，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中华书局，2000年，第156—157页。

⁹² 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第148、162页。

之声，沸聒天地。民庶间有嬉笑欢腾者，有悲怆涕泣者。……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持之一步一礼，血流满地。至于肘行膝步，啣指截发，不可胜数。又有僧以艾覆顶，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窘迫，凡见者无不大笑焉。……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傍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逾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及万数。……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喝于其间，恣为嬉戏。⁹³

皇帝本人的虔诚和支持，寺院的重视和极力鼓动，以及京城百姓对佛教近乎疯狂的顶礼膜拜，使这场声势浩大的迎佛骨仪式成为当日皇城自开远门到安福门整条大街及周围各坊的壮丽景观。仪式本身的盛大景象借助宽阔的街道和高耸的城楼得以最充分的展示，行进队伍的“豪华阵容”以及观览人群的高度聚集又进一步增强了其视觉和声音上的效果。宗教仪式和国家礼仪在这样的场景中走向一定程度的结合。

中宗景龙三年（709年）七月，曾在安福门设无遮斋，命三品以上官员行香。⁹⁴这又可以印证安福门外应当具有空间相对开阔的场地，以供举行这样大规模的斋会。武德元年（618年）举行的佛事活动设在南当皇城正门的朱雀门，并“于朱雀门南通衢之上，普建道场，设无遮斋会”⁹⁵，遍布整条朱雀大街。不仅是安福门、朱雀门，就连掖庭宫西、北当禁苑的芳林门，也举行过大规模的千僧斋会：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四月“甲寅，幸兴福寺赐绢一百匹。辛酉，西市百姓于芳林门为无遮僧斋，命中使以香施之。”⁹⁶有关佛教的仪式对城门地点的选择，与城门周边的寺院也有密切关联。于芳林门举行的无遮僧斋，即与其附近位于修德坊内的兴福寺有关。显庆元年（656年）四月八日，玄奘率京城僧尼，备幢旛、宝辇、香花、梵仪扣芳林门迎御制碑。“敕太常九部乐，并长安万年二县乐戏及威里侯王耆耄送之。是日以雨不克，十四日遂迎之”⁹⁷，高宗“御安福门观僧玄奘迎御制并书慈恩寺碑文”⁹⁸。位于长安城东，临近通化门的章敬寺“寺抵国门，贤愚必至”⁹⁹，皇帝基于佛教意义之上的赏赐，多次在通化门进行。穆宗长庆三年（823年）八月，“上由复道幸兴庆宫，至通化门，赐持盂僧绢二百匹，因幸五方，赐从官金银钗有差”¹⁰⁰，同年十一月，又“御通化门，观作毗沙门神，因赐绢五百匹”¹⁰¹。

四、主干街道：城门功能的延伸

无论是皇帝亲临城门的仪式，还是官方以城门为舞台举行的活动，在对大唐都城长安雄伟威严的塑造中，城门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这样的塑造不仅体现在高大的城门楼阁和坊墙严整的都城布局上，更体现在唐帝国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位于长安城中轴线之上的承天门、朱雀门，前者作为外朝核心地而成为皇帝即位、颁布诏令、大赦等相对固定的地点，一般来说这些仪式更加庄重严肃，象征皇权威严；而后者直接面对外郭城，与朱雀大街的连通使其具有足够开阔的场地更多地上

⁹³ 相关记载见《旧唐书》卷一九上，第683页。此处所引为汤用彤先生《隋唐佛教史稿》据《杜阳杂编》并参以《剧谈录》整理之内容。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30页。

⁹⁴ 《旧唐书》卷七，第147页。

⁹⁵ 【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一〇〇，传记篇兴福部第五，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894页。

⁹⁶ 《册府元龟》卷五二，第579页下。

⁹⁷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一四，《永乐北藏》整理委员会编，《永乐北藏》（第一百九十册），北京：线装书局，2000年，第515页上。

⁹⁸ 《旧唐书》卷四，第75页。

⁹⁹ 《太平广记》卷二一三，《周昉》条引《画断》，第1631—1632页。

¹⁰⁰ 《旧唐书》卷一六，第503页。

¹⁰¹ 《旧唐书》卷一六，第503页。

演一些长安市民“倾城而出”的活动，由于参与的群体范围扩大，在这里举行的仪式也具有相对世俗化的特点。对于其他城门而言，其所处的位置和周边环境等因素，决定了仪式根据其本身的需要而对城门进行的选择。究其规律，皇城东西两面的安福、延喜门，以及外郭城的通化门，是皇帝经常亲临的城门。其原因，通化门在外郭城诸门中，距离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的距离都较近，门外的章敬寺亦常作为送行仪式中百官列班的场所；安福、延喜二门迫近宫城，基本可以满足皇帝亲临宣慰、献俘仪式，赏灯娱乐活动，以及迎接饯送出征的大臣、和亲的公主之需要；安福门之北贯穿开远门——承天门——通化门的東西向街道，宽度达 100 步（147 米）¹⁰²，因其交通便捷，视野开阔，利于人群的聚集和仪式的展开，而成为经像、佛骨西来的路线和举行大规模佛事活动的舞台。

就唐都长安而言，连通外郭城东西六城门和南面三座城门的街道，即是通常意义上所指的“六街”。¹⁰³“六街”作为长安城的主干街道，是城市中颇具典型意义的公共空间，也是城门功能的进一步延伸。这种延伸不仅指地域空间的层面，也体现在社会空间的层面。前面提到的迎接经像和佛骨入京的仪式，经过的路线不仅是城门，更以开远门——安福门整条街道为开放性的舞台，演绎出隆重壮观的场景。街道具有开阔性、延展性、开放性等特点，适宜大规模仪式的展开。这一点在承天门——朱雀门——明德门的中轴大街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白居易《过天门街》诗云“雪尽终南又欲春，遥怜翠色对红尘。千车万马九衢上，回首看山无一人。”¹⁰⁴

在“六街”中，承天门——朱雀门——明德门这条宽达 100 步的街道，作为长安城的中轴线，将皇城和外郭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外郭城的区域以此为界分属万年、长安两县管辖。承天门街为皇城的中轴线，南北长度为 3 里 140 步。自朱雀门抵明德门的街道，即“朱雀街”或“天门街”，长 9 里 175 步。¹⁰⁵平冈武夫在《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长安城的展视”中指出，据《延喜式》“左右京职”条，朱雀大路宽 280 尺，由四个部分组成：中央是 234 尺的车马道，其左右分别有 5 尺的沟、15 尺的狗行道及与到坊壁的间距 3 尺。¹⁰⁶《延喜式》的记载与长安城的实际情况究竟有多少出入，我们尚无法得知。但对于长安城中的主干街道，唐代有明确的规划和管理措施。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正月，令于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代宗广德元年（763 年）又全面禁止在“六街”之上种植树木。一年之后，“又诏：禁之初，诸军诸使以时艰岁俭，奏耕京城六街之地以供刍，或谓非宜，乃罢之。”¹⁰⁷《旧唐书·吴凑传》载“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¹⁰⁸据《册府元龟》记，武宗会昌元年（841 年）的诏令曾禁止在天门街这条中轴大街两侧的坊中设立私庙。¹⁰⁹

前文已论述承天门及门前横街所具有的宫城前广场之性质，承天门街又使仪式展开的舞台在南北方向上得以扩展。天门街是举行国家祭祀活动——祈雨仪式的重要场所。¹¹⁰《法苑珠林》载“贞

¹⁰² 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 2 页。

¹⁰³ 关于唐长安“六街”所指，宁欣在《诗与街——从白居易〈歌钟十二街〉谈起》（《中国历史文物》2005 年第 5 期，73—79 页）中已进行充分论证，明确其为通东西六城门和南面三城门的六条大街。

¹⁰⁴ 【唐】白居易：《过天门街》，《白氏长庆集》卷一三，第 66 页。

¹⁰⁵ 以上数据出自自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第 148 页。

¹⁰⁶ 平冈武夫《唐代的长安与洛阳地图》，第 12 页。

¹⁰⁷ 《册府元龟》卷一四，第 159 页下。

¹⁰⁸ 《旧唐书》卷一八三，《吴凑传》，第 4748—4749 页。

¹⁰⁹ 《册府元龟》卷五九二，第 7080 页上。相关记载见《唐会要》卷一九，第 452 页。

¹¹⁰ 参见雷闻《祈雨与唐代社会研究》（《国学研究》第 8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0 月）从礼法制度、宗教因素及民间祠祀与祈雨之关系等三个角度分析了唐代祈雨活动与社会的关系，认为中央祭礼中，祈雨仍以儒家传统的大雩之礼为中心，同时，佛道二教的宗教仪式逐步进入宫廷和地方政府的祈雨活动，而民间祠祀则在地方政府的祈

观元年（627年）献春之月，受诏闾京众僧德行之者，并令入内殿行道。各满七日，有司供备务在精华。至三年帝恐年谷不登，忧矜在虑，爰发纶旨。简精诚宿德并侍者二七人，于天门街祈雨七日。圣力冥扶，稼苗重稔。家丰万箱之敛，国富九年之资。自尔已来常丰不绝。”¹¹¹代宗时任京兆尹的黎干，曾“祈雨于朱雀门街。造土龙，悉召城中巫覡，舞于龙所。干与巫覡更舞，观者骇笑。”¹¹²德宗贞元年间，著名琵琶手康昆仑也出现在祈雨仪式中，这场祈雨仪式最终引发了东西两市一场声势浩大的竞赛：“贞元中有康昆仑，第一手。始遇长安大旱，诏移两市祈雨。及至天门街，市人广较胜负，及斗声乐。即街东有康昆仑琵琶最上，必谓街西无以敌也。遂请昆仑登彩楼，弹一曲新翻羽调《录要》。其街西亦建一楼，东市大诮之。及昆仑度曲，西市楼上出一女郎，抱乐器，先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枫香调中。’及下拨，声如雷，其妙入神。”¹¹³宪宗之子荣王聘妃，也将仪礼的舞台设在天门街。诗人张光朝和梁铉分别作诗，记录当时的胜景：

仙媛来朱邸，名山出紫微。三周初展义，百两遂言归。
郑国通梁苑，天津接帝畿。桥成乌鹊助，盖转凤凰飞。
霜仗迎秋色，星缸满夜辉。从兹磐石固，应为得贤妃。¹¹⁴

帝子乘龙夜，三星照户前。两行宫火出，十里道铺筵。
罗绮明中识，箫韶暗里传。灯攒九华扇，帐撒五铢钱。
交颈文鸳合，和鸣彩凤连。欲知来日美，双拜紫微天。¹¹⁵

在震动朝廷和整个京城的政治事件中，这条中轴大街往往作为事件发生的中心地出现。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入侵长安。武将王甫“诱长安恶少数百人集六街鼓于朱雀街，大鼓之。吐蕃闻之震慑，趁夜而遁。”¹¹⁶唐末动乱，王行约与弟行实联合枢密使骆全瓘，“谋挟帝（昭宗）幸邠”，而时在右军的李茂贞党李继鹏、刘景宣则“欲以兵劫全瓘等，请帝幸凤翔”，“两军合噪承天门街，帝登楼谕和之，继鹏怒，辄射帝，纵火焚门，帝率诸王及卫兵战，继鹏矢及帝胄，军乃退。”¹¹⁷由此可见，承天门街——朱雀门街一线，贯穿都城长安宫城、皇城、外郭城南面的三座正门，作为都城的中轴大街，起到“牵一街而动全城”的作用，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其政治社会方面的功能。在这条街道上举行的徇街公斩，也往往具有较强的警示意义。高祖李渊入长安后，将发其祖坟的隋将阴世师、骨仪、崔毗伽、李仁政等斩于朱雀街道，“以不从义而又悞焉。余无所问。京邑士女，欢娱道路，华夷观听，相顾欣欣。”¹¹⁸天宝十三载（754年）三月，北庭都护程千里生擒突厥首领阿布思，献俘于兴庆宫勤政楼下，斩之于朱雀街。¹¹⁹无论斩杀的是隋末旧将还是突厥首领，在主干街道朱雀街上的行刑，无疑都具有明显的宣示意图，大唐皇帝的威仪得到了充分展现。这条贯穿长安城南北的中轴大街，扩展了承天门及其前宫廷广场的地理空间，在社会空间的层面则是对承天门、朱雀门

雨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既与国家礼典的模糊性有关，又反映了地方政府面对自然灾害的威胁凝聚民心的实际需求。

¹¹¹ 《法苑珠林校注》卷一〇〇，传记篇兴福部第五，第2896页。

¹¹² 《太平广记》卷二六〇，第2032页。

¹¹³ 【唐】段安节：《乐府杂录》，康昆仑，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2—23页。

¹¹⁴ 【唐】梁铉：《天门街西观荣王聘妃》，《文苑英华》卷一八九，第925页下。

¹¹⁵ 【唐】张光朝：《天门街西观荣王聘妃》，《文苑英华》卷一八九，第925页下。

¹¹⁶ 《册府元龟》卷三六七，第4363页上。《旧唐书》卷一一，第273页。

¹¹⁷ 《新唐书》卷一八七，第5438页。

¹¹⁸ 【唐】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7页。

¹¹⁹ 《旧唐书》卷九，第228页。

功能和意义的进一步延伸。

五、结语

唐代的都城长安，在六至九世纪中的绝大多数时期，作为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坐落在关中平原的渭水南岸。在这座设计缜密、管理制度严格的都城中，两市、坊里是居民的重要居住和活动场所。正因如此，在以往的城市史研究中，城门更多的只是作为防卫的关卡和出入的通道存在。然而，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城市布局中的城门与两市、街道、坊里同样，都具有城市社会空间的意义。本文的论述，即是在这样的思路之下展开的。

城门在政治层面作为社会空间的意义，在长安“中轴大街”之上的承天门、朱雀门和明德门表现得尤为突出。以其为舞台举行的仪式，往往蕴含国家礼仪的意义。由这些城门，包括其高大的城楼和门前的广场构建的社会空间，也具有国家礼仪空间的性质。¹²⁰这些仪式，有的仅限皇亲国戚和朝中官员参与，有的则将长安居民都列入旁观者的行列。恩赦仪式表征大唐皇帝将恩泽施及广土众民，当众举行的献俘和处决则从另一方面宣示皇权威严。皇城东、西面的城门，常为节庆娱乐和佛事活动中皇帝亲临之场所，皇帝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与民同乐的意愿或对佛教信仰的虔诚态度，官方的意识形态在官民互动的情境之下传播到民众中间。可以说，长安的城门作为城市社会空间，是各类仪式举行的舞台，在这些仪式中，城门又是作为上下信息得以交换的场所而存在的。中唐以后长安政治中心由太极宫向大明宫的转移，使承天门一线的作用有所减弱，丹凤门街开始承担较多的政治层面的机能。

当我们将唐都长安的城门置于城市社会空间的视野之下进行考察，其呈现出的，就已然不仅仅是防卫的关卡和出入的通道，而承载着更多更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层面的内涵。以城门为枢纽营造出的各具特色的互动空间和平台，促使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城市空间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多向交流得以实现。以王朝政治为核心，在宫城、皇城正门举行的大赦仪式面向长安百姓和国土众民，皇帝向民众宣布政令，民众在这样的仪式中作为政治运作过程中的参与者，亲临其境地感受皇恩之浩荡；国家祭典是塑造礼法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亲率仪仗卫士，经承天门——朱雀门——明德门穿过中轴大街前往明德门外的郊祀现场，城门和街道本身亦是仪式展开的舞台；皇城和外郭城东西面的城门，则在献俘、宣慰仪式，送行和迎接出征将领、外任官员以及和亲的公主之仪式中发挥重要作用，表达典型的象征意义。迎接经像和佛骨的宗教仪式，借助开远门——安福门宽阔的街道、两边坊内的寺院和高大的城楼，实现了宗教仪式和国家礼仪的充分结合。宗教仪礼本身所要传达的信息，可能更多地面对僧侣和信徒，但在城门和街道共同构筑的空间范围之内，在王朝政权的支持和宏大规模的仪式渲染之下，这些仪式成为轰动全城的事件，更多的长安民众得以耳闻目睹亲身感受。

“门”的功能和作用，是建立在“城”的背景之下的。而唐都长安之“城”，其首要角色是国都，是与王朝政治紧密相连的。在作为受律令制度层层限制的关卡的同时，城门在王朝政治中显示出其沟通上下和信息传递的作用。在这样的视角之下，我们发现，城门由单一的出入通道转向内涵丰富的政治空间；长安静的城市地域空间和动的社会空间得以一同进入我们的研究视角中；在相对静止的制度之下，流动的社会彰显出纷繁的色彩。

¹²⁰ 参见妹尾达彦《唐长安城的礼仪空间——以皇帝礼仪的舞台为中心》，《中国的思维世界》，第466—498页。

作者简介：万晋（1984—），女，山东济南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五代经济史、社会史。

Vertical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Between Different Levels——The
Significance of Political Space of City Gates in Tang Chang 'an

Wan Jin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ancient China, Tang Chang 'an is a typical capital. Although certain changes of cities had begun in the middl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hang 'an was still a relatively closed area during 6-9 Century. With this background, as being important urban architectures, the Cities gates in Chang 'an also have multiple meanings of political spa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city gates in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Ta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Tang Dynasty, Chang 'an, City gate, Political space